

第二章 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節 第一次革命高潮

一 日本投降以後的慘狀与人民組織的萌芽

在美國佔領軍和它所“利用”——正確的說是作為它的走狗同盟——的日本反動政府下，日本人民的生活遭受了空前的殘酷破壞。除了少數資本家、特權官僚和地主富農外，所有的日本人民無不在飢餓線上掙扎。主食的配給標準，假使以大米計算，僅和兩合一勺[⊖]所能產生的卡路里相等；這還是連原屬家畜飼料的豆餅、馬鈴薯皮的卡路里都計算在內了。人們並非在吃飯，而是吃了由辦公桌上所計算出來的卡路里。由於蛋白質特別缺乏，普遍發生了營養不足的現象。但即使是這種配給，自一九四六年開始，還經常是遲發或者欠發；而到了同年三月以後這種情況就更嚴重了。此外，連燒飯的燃料都沒有，所以在嚴寒的冬天想用木炭暖暖窩棚，那就被認為是太奢侈了。至於添購新衣服，在人民來說幾乎是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了。

由於政府對大資本家的付款——包括軍需品“貨款”、各種軍事“補償費”、美軍設施費以及其他支出——以致急劇的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投降時日本銀行的貨幣發行額高達二百八十六億日元；但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就迅速超過六百億日元了。資本家對於為和平生活而恢復生產實行怠工，並採取了囤積原

[⊖] 十日勺為一日合，十日合為一日升，一日升相當於我國一點八市升。——譯者

料和依靠通貨膨脹坐待原料漲價的手段。生產由於資本家的怠工急遽的減少了，這給通貨膨脹火上加油；同時也給壟斷資本帶來了一個危機。銀行存款急遽的減少了；靠軍需生產支持的戰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系崩潰了；銀行對於企業的支配力量也發生了裂痕。於是日本政府在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部的命令下，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頒佈了一個自稱是爲了遏止通貨膨脹的“經濟金融緊急措施法”。其中規定以新日元代替舊日元，強迫人民將其持有的一切舊日幣概行存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而人民自存款中所能提取的生活費數目，每戶每月只限於三百日元，家族每人只能提取一百日元。至於提取企業資金，一般也是很難辦到的。因此銀行獲得了大量並無被提取之虞的存款；而這種存款的貸借，却要按照政府所規定的企業種類順序辦理，並附有無數的麻煩條件。這使銀行取得了對於企業的絕對支配力量。自然，通貨膨脹並未因此停止。壟斷資本和政府勾結在一起，他們想要有多少新日元就可以有多少。雖然宣傳說不論窮富都得過每月三百日元的勒緊腰帶生活；實際上，資本家的生活並非如此。他們可以鑽無窮無盡的空子，過着隨心所欲的豪奢生活。貨幣發行額在禁用舊日元以後，僅僅降低爲一百五十億日元；其後不久復又急遽增加，到了第一次吉田內閣成立時，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已經增加到三百六十三億日元；而吉田內閣更有計劃地促進了通貨膨脹。

工人的實際工資降低到驚人的地步；生活費指數如以戰前一九三七年爲標準，則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東京上漲了十四點八倍，在大阪上漲了約二十二倍。在同一時期內的工資，每日平均工資從兩日元四角八分增加到十日元七角八分，不過增加了四點四倍。單從這個指數的比較來看，雖可認爲勞動人民的生活程度降低到僅及戰前的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但單憑這一點實際上並不能得到關於工人的工資低微和生活實況的明確印

象。这个所谓一九四六年的生活費，是悲惨已極的生活費用，其中大部分是用在不堪人類食用的、營養不足的伙食費上面。吃的是相当於二點一合到二點三合所能產生的卡路里的主食配給及由黑市買來的若干食品，穿的是襤褸不堪的衣服，住的是原始人的窩棚或兩家合住一間四疊半草蓆的房子。總之，如果用战後名義工資的指數和物價指數相比較，據此來談論實際工資究竟提高和降低了多少，是毫無意義的。假使以收入來衡量人們實際能過怎樣的生活，那麼从战争末期到投降後的工資，簡直連列入“低工資”的範疇都够不上的。

在这种嚴重的糧食危机、通貨膨脹以及一般人民生活在衣食住行^①各方面都遭受了空前破壞的緊急時期，數百万人却被無情地拋到街頭變成了失業者。在战時藉徵用和動員奪去其長期賴以為生的買賣和職業，被迫往鑛山和軍需工廠去從事奴隸勞動的人民，与战争結束同時，又以“打了敗仗沒有办法”為口實，連一文表示同情的退職金都未發給就被解僱了。即使根據一九四六年四月厚生省的人口調查，在調查前的一個月內，完全失業者為一百五十九万人（其中婦女五十三万人）；僅工作一日至七日者為九十六万人（其中有婦女二十七万人）；工作八日至二十日以下者為二百一十九万人（其中婦女五十万人），共計有四百五十四万人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這個數字，不論从婦女失業者是以極端縮小了的數字來計算的——因為婦女即使失業却被当做“重回家庭”者而不算作失業者——這一點來看，或从小販及返歸農家的人未被当作失業者來看，實際上的失業者和半失業者的人數將超过這個數目的兩倍。至於就業工人，也因

^① 當時交通運輸之所以極端困難，不僅是由於战争对交通運輸設備的破壞和火車用煤的顯著缺乏，而且还由於这种貧乏的運輸力量大部分被美國佔領軍所獨佔的緣故。根據馬克·蓋因的“日本日記”所載，仙台美國佔領軍的軍官為了去东京遊逛，竟全要出了專車。——原註

爲資本家對生產怠工，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全體工廠工人整月內的平均就業日數不過十九點一日；其後雖略有增加，但是也僅止於二十二點九日而已。總之，整個工人階級都是在極不安定的就業狀態中。

農民的處境也絲毫未見得好些。有人傳說小生產者的農民，在空前的糧食危機和通貨膨脹下，曾利用黑市交易賺了錢。中農以上，特別是靠近城市的農場主，確實曾有意外的繁榮。但是佔日本農業人口大多數的、經營土地面積不到五反[⊖]的貧農，不僅沒有餘糧從事黑市買賣；而且還得忍受極其殘酷的徵糧制度的痛苦。他們因爲缺乏肥料，收穫大減；並且還得养活從軍隊和工廠（徵用勞工）復員歸來的家族，因此自己的食米都發生了困難。雖然如此，政府仍把空前的糧食危機的責任加在農民身上；一九四六年三月日本政府以強制手段徵購糧食。同年四月政府對東京附近在全國徵糧成績最壞的栃木縣芳賀郡某村發動了第一次的強制徵糧；可是遭到警察闖入的任何家庭，還在四月裏就已經連食米都沒有了。貧農已在吃草度日。一方面小農和貧農遭受了這種殘酷的掠奪；另一方面把持農村權力的富農和地主，却將他們所有的上等田地和貧農的下等田地都按每反相等的數量來攤派徵糧。他們並隱瞞田地、逃避徵購，以便減少自己的攤派額，而把負擔轉嫁到貧農和小農身上。他們從事黑市交易大發其財；但警察對於這些老爺們的所作所爲却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此外，農民大眾並因如後所述的地主們的拚命收回出租土地，以致陷入不安定的深淵裏。

那末，工人、農民和一般市民大眾如何來擺脫這種悲慘的境況呢？他們最初爲了處理個人問題已經精疲力盡了。他們既無有組織的行動，也不會尋求政治上的解決途徑。這也難怪他們，

⊖ 一反合九·九一八公畝。——譯者

因為當時並沒有一個給日本國民指出一條應走的道路並領導他們前進的組織。假使戰時在非法狀態下有一個全國性的人民組織從事地下活動以待時機，並與戰敗同時能出面活動，來集中日本人民大眾的力量追究戰犯，阻止他們盜竊國家財產，並為重建和平民主的國家和國民生活進行有組織的活動，那麼日本國民即使在長期戰爭、盲目轟炸和戰敗的破壞下，大概也能過比目前還要稍好一些的生活。然而這種有組織的民主勢力，戰爭時期既不會存在，而在日本投降後舊統治階級極端動搖的头兩個月內也未曾出現。在日本固然也有許多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是其中最優秀的大部分人們，在日本投降後仍然被關在監獄裏。在監獄外面的人，也沒有一個統一領導的組織。如果說美國佔領軍是解放日本人民的軍隊，那末與日本統治階級投降同時，它必然會釋放一切政治犯，廢除一切鎮壓人民的法令並宣佈其歸於無效，藉以促成人民的革命活動。但這種事情是不應對美國軍隊存有任何希望的。因此對於人民革命最寶貴的兩個月時間就這樣浪費掉了。而美國佔領軍却利用這段時間通過日本政府組成了密如蜘蛛網的反革命佔領機構；日本反動勢力也乘這個時機大体完成了和佔領機構保持有機聯系以便生存下去的準備工作，開始從戰敗的震動下站穩了腳步。美國佔領軍等到將這一切都準備就緒以後，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開始發佈了釋放政治犯，廢除“治安維持法”等的所謂“日本民主化”的抽象指令。

以德田球一為首的共產主義領袖們及其他許多黨員，從多則十八年少則數年的監獄生活中釋放出獄後，立即號召日本人民為打倒天皇制度、建立人民共和國、無條件地廢除寄生地主制度、組織工會的自由、建立集體談判權、廢除維護軍閥、官僚和壟斷資本家利益的統制經濟、建立由人民管理並為人民利益的計劃經濟、實行十八歲以上的男女平等的普選、廢除一切鎮壓人民的法令以及為建立基本人權而奮鬥，而他們則站在人民的前列

開始進行積極的活動。日本共產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恢復了它的機關報“赤旗報”，發行了復刊第一號，在所有的工廠、鑛山、農村和城市建立工會、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以及建立其他為克服糧食危機的市民組織；此外，共產黨除領導羣衆進行了反對解僱、要求提高工資、反對地主收回租地、要求減免地租、反對強迫徵糧制度、揭發軍閥、官僚和壟斷資本家所隱匿的物資並使其歸人民管理等鬥爭外，並召開了整肅戰犯人民大會，活潑地展開了宣傳黨的綱領的活動。根據日共總書記德田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到三日所舉行的第四屆（從日本共產黨成立時算起）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當時日本共產黨黨員人數為一千一百八十一名；“赤旗報”第一號發行數一萬份，嗣後繼續激增，第五號的發行數已達九萬份；而以後要求入黨的人數也迅速地增加了。

戰前的民政黨、政友會和社會民主主義各政黨的舊幹部，在日本投降後雖然立即從事重新組黨的準備工作；但是他們並非用製訂政策訴諸國民的方法爭取同志，而是由他們私下商妥以後來拉攏黨羽。所以他們彼此間勢力的爭奪非常劇烈，很難形成一個統一的政黨。但是當他們看到共產黨的活動有着顯著發展時，於是使張皇失措勉強湊合起來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月底到十一月之間，先後成立了日本進步黨、日本自由黨、日本社會黨和協同黨等。進步黨是以舊民政黨的部分人員和舊政友會的中島派為中心；自由黨是以舊政友會的鳩山派為中心湊成的。這兩個政黨都公然以壟斷資本家、地主和官僚為基礎，而以“維護天皇制”為其最大的口號。這兩個黨在成立時的幹部和議員，其中大部分都由於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公職整肅令被整肅了。

社會黨是由戰前的社會大眾黨及其他各色各樣的“無產黨”幹部合併湊成的。它網羅了為“防止赤旗的暴風雨”（西尾末廣語）由資本家公開派遣到工農陣營的最右翼分子片山哲、西尾末

廣等以及願意和共產黨合作的各色各樣社會民主主義者，而黨的領導權主要掌握在右派手裏。社會黨的階級基礎，是小資產階級和已經爬到半封建性工頭地位的工人貴族，它的口號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單就這個口號來看，好像它比以實行民主主義革命為當前目標的共產黨還要激進；但是它所謂的“社會主義”，並非要打倒資本主義，而是要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政策，它甚至反對廢除專制的天皇制度。社會黨內那批曾充當過大政翼贊會^①和產業報國會^②的幹部，並曾驅使工人從事軍事強制勞動的傢伙，後來被整肅並禁止擔任公職。協同黨的階級基礎主要為地主富農，它的綱領號稱提倡“合作社主義”，主張採取保護小生產者的、比右派社會黨還要軟弱的社會政策。

日本人民開始有了自己的組織。雖然在日本投降時，連一個工會都沒有；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工會已經發展到九百二十五個，加入工會組織的工人計有四十九萬人。一九四五年年底制定了工會法，宣佈所有公私企業的工人，都享有組織工會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等。無條件承認這類現代工人應有的權利，對於發展工人組織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底，工會已有七千三百五十三個，加入組織的工人計有二百七十九萬人。在工會中，一部分與戰前的“日本勞動總同盟”有聯繫，主要是以行業為單位所組成的；它們採取勞資協調主義的立場，未明確規定有支持政黨的自自由，且有許多工會公開表示支持社會黨。其餘的大部分工會則原則上是以企業為單位所組成的，它們堅持工人階級立場，公開聲明反對資本家；這些工會幹部多半屬

① 大政翼贊會是日本戰時——一九四〇年十月成立的日本法西斯統一政黨，日本反動政府利用它代替已被解散的各政黨。——譯者

② 產業報國會是日本戰時成立的御用法西斯工會，利用它代替已被解散的各工會。——譯者

於共產黨系統，會員有支持政党的自由。在一九四六年春，這兩大系統的工会，尚未發展到明顯分裂的程度，立場不同傾向不同的各地工会，曾組成了地方工会協議會。

隨着工会的發展，工人反對解僱和要求提高工資的爭議日益劇烈起來。自一九四五年年底起，罷工運動首先在煤礦和金屬、機械工廠爆發；及至一九四六年，所有各地的一切產業部門都展開了鬥爭。工人在最初的爭議中，經常採用了管理生產的戰術。資本家選擇了生產怠工的手段，一方面利用高抬貯存物資和原料的價格坐收其利，另一方面則解僱工人和听任實際工資下降。爲了與資本家相對抗，工人在罷工時並不放棄工作，却實行管理生產，並藉管理工廠生產獲得利益，以保衛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的生活。工人自行管理生產不僅可以粉碎資本家的生產怠工，而且顯示了資本家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不但毫無用處，並且是一種障礙。所以這種戰術非常適合當時的日本國情，因此獲得了人民大眾的一致擁護。這對於資產階級來說，不論在物質上、精神上、政治上都是嚴重的打擊。

在日本農村裏，也到處都掀起了反對強迫徵糧、反對地主收回租地以及要求減免地租的鬥爭浪潮。幣原內閣的農林大臣松村謙三曾在一九五二年三月某次座談會上回憶當時的農村情形說：“我爲了督促徵糧前往新潟、秋田、山形各縣附近視察農民情形時，使我感到情況非常不妙；疲於長期戰爭的農民心理，決非維持現狀所能平息。農民不斷說：‘我們不能安於忍受這種租佃制度’。我看了這種情形，認爲現狀絕對維持不下去，土地問題將一定發生。這使我痛感如果置現狀於不顧……農村將陷於混亂不堪的狀態”（“改造”月刊，一九五二年四月號增刊）。當時的日本農民協會中央委員稻村順三在同一座談會上也說：“農民當時既感到受地主的壓迫，又感到政府強迫徵糧的痛苦。這是由於戰敗使農民產生了類似暴動的情緒。他們說：‘誰會交什麼米，誰會

放棄土地’。這就是他們當時的情形”。這兩個人的談話，並沒有誇張。所以日本政府，爲了緩和農民情緒，爲了維持農村中的反動秩序並使農民溫順地拿出米來，在接到美軍總司令部的“土地改革”指令以前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內閣會議上，就通過了第一次的“土地改革法”。關於這個法案，我們將在下面詳細說明。農林大臣松村在衆議院說明這個法案時曾經說道：“如果不能用最穩健和最可靠的方法”實現“土地改革”，那麼日本農村“不僅在增產糧食上，而且在思想和文化上也有陷於極不安定狀態的危險”。

第一次“土地改革法”的頒佈，實際上起了促使地主加速收回租地的作用。從一九四六年一月起，僅就官方調查的數字來說，發生土地糾紛的次數，每月已超過三萬件。從日本投降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地主收回租地的件數，官方的統計數字雖總計不過二十萬件，但估計實際數目將超過這個數字的十倍。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就是說，每月最少有三萬件反對地主收回租地的糾紛案。因此農民鬥爭的激烈程度是過去所不可能想像的。在這種鬥爭過程中，一九四六年二月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日本農民協會”（簡稱“日農”）組成了。在全國所有的農村裏幾乎也都建立了日本農民協會支部。

一九四六年三月當日本政府決定採取強制徵糧制度時，全國二十多個府縣召開了反對這個措施的農民大會，參加大會的人數從數千人到兩萬人不等，農民的憤慨幾乎釀成暴動。例如在栃木縣曾有農民一萬多人兩度集合在縣政府，迫使縣長答應了在他發動強制徵糧之前，必須先和農村常務委員會商量。

日本農民曾經發揮日本農民協會的組織力量，要求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而非虛偽的土地改革。戰前日本的農民鬥爭，幾乎全部都是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鬥爭。但是現在却環繞着要求徵糧合理化、民主化，以及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這類問題，發展成

爲佃戶、自耕農並包括中農在內的廣大勞動農民羣衆具有政治意義的鬥爭了。

市民也發動了克服糧食危機、揭發隱匿物資並將其實行民主管理的運動，在各地成立了糧食管理民主化聯盟及其他各種市民組織。日本政府對於這類揭發，一面把檢舉隊視爲強盜，一面詭稱所謂隱匿物資實在並無其事。但是實際上則如前所述，高級官僚、軍人 and 大資本家曾盜竊了大量的衣料、糧食、工業器材和原料。在學校方面，一九四五年十月東京上野某女學校學生揭發了該校校長等的不正行爲，並表示反對軍國主義教育。這一行動曾經轟動一時，而以此爲開端，立即在日本全國掀起了與此相同的、排斥軍國主義校長和要求校內民主化的運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運動首先在女學校、中學校和師範學校發動起來，而大學、商業專科學校學生展開反對法西斯教授的鬥爭，乃是以後的事情。

當時日本的新聞雜誌界，曾比較正確地反映了這時輿論的動向。日本報紙像當時這樣激烈地連日攻擊政府的反動，像當時這樣多的報道工人和農民的動向，簡直是空前的舉動。一九四六年一月，當共產黨領袖野坂參三從十六年的流亡生活返歸日本時，所有的報紙恰如對待一位凱旋將軍似地來歡迎他。

日本的工人、農民、市民及一切勞動人民在新的政治生活面前覺醒了，他們的政治熱情燃燒起來了；這無疑地是革命情緒的高漲。舊統治階級的威信隨着日本的戰敗正在繼續崩潰下去。日本天皇、將軍和大臣，昔日的威嚴喪失淨盡。不論在哪一個縣政府裏，都可以看到身穿工作服的工人、農民和市民隨便出入縣長室對縣長高聲叱咤。對於有組織的羣衆，連警察都不敢過問。至於勞資糾紛，勝利總是屬於工人的。一切人民大眾的威信也開始建立起來了。

假使在這個時候能把工人、農民和市民的單獨鬥爭統一起

來，爲爭取政治權力進行有意識的、有計劃的鬥爭；假使在這個時候能够組成人民民主的統一戰綫，爲保證全國人民獲得民主、職業和土地的权利進行鬥爭，爲建立一個能够負責重建祖國和平的、人民的民主政府而鬥爭；那麼雖然同樣在美軍佔領之下，也可以使民主化稍爲徹底一些。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日本共產黨雖然曾向當時準備組織社會黨的人們提出上述的聯合鬥爭的要求，但是他們藉口建黨以前不能表示意見拒絕了這個要求。接着日本共產黨在十一月八日正式決定和發表了人民統一戰綫綱領，並在十二月六日，由共產黨代表再度向當時業已正式成立了的社會黨（十一月二日成立）提出了聯合鬥爭的建議，其中表示儘管由於兩黨對天皇制的意見不同而在這一點上不能採取一致行動，但在日常鬥爭、勞資爭議、農民運動等能够意見一致的問題上仍可進行聯合鬥爭。然而社會黨對於這個建議的答覆是：“從中央到地方，都拒絕聯合鬥爭”。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東京日比谷公園會召開一次歡迎野坂參三歸國的人民大會，參加大會的約有兩萬人。當時野坂參三曾強調指出在日本天皇政府那種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殘酷迫害下，爲了反對侵略戰爭和爲了民主主義而鬥爭的共產主義者才是真正的愛國者的這一事實，同時並號召團結一切共產主義者以外的無數愛國者，爲了人民的民主主義而不是爲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組成民主統一戰綫。這個號召，曾受到羣衆的擁護。於是，人民大眾要求建立民主統一戰綫的聲浪日益高漲；但是社會黨却誣衊共產黨不講信義和友愛，不但反對建立統一戰綫，甚至仍然拒絕了聯合鬥爭。

二 從幣原內閣垮台到五一勞動節與糧食勞動節

美軍總司令部對於日本人民迅速的革命覺醒和在全國各地日益發展的人民鬥爭是密切注意毫不放鬆的。它的判斷是：要

在民主統一戰綫建立之前舉行大選，並必須使保守勢力獲得勝利。曾研究過美軍總司令部當時的对日政策的美國太平洋問題研究會的畢遜，在他的著作中說：美軍總司令部對於一個被輕視為“習慣於威权統治的臣民”的日本人，能够“利用日本投降的機會迅速而活潑地展開了爭取民主的行動”，曾感到“驚奇和惶惑”。此外，他还說：“當時日本人民的新興勢力在解決日本各項問題上，毅然採取了獨立和激進的態度；而同時由於保守派也適當地換上民主的招牌正重新組織起來，所以美國佔領當局在決定第一次日本大選時期的問題上，曾引起決定性的嚴重分歧。反对早日舉行大選的人，認為舊勢力事實上仍舊支配着日本的政治機關，所以他們主張必須給予人民以充分的時間去建立全體國民的組織，使人民的新興勢力能够進行有效的選舉鬥爭。這一派人認為如果早日舉行大選，只會重新加強在新招牌下的舊勢力，使其改頭換面以新姿態出現而已。另一派人主張应当早日舉行大選，他們認為佔領的主要目的，乃是尽可能在短時期內建立日本人的負責政府（中略）。但是我們難道能讓日本民主前途的這件斗篷，披在社会党和共產黨的領導者身上嗎？美軍總司令部根據這種考慮，不顧遠東委員會应当緩期舉行大選的劝告，仍然決定了早日舉行大選。”（見畢遜：“日本民主主義的前途”，一九四九年紐約版）

於是，美軍總司令部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民主主義的形式來保存反民主的勢力。縱然說美軍總司令部對於大選運動的露骨干涉並不太多，但是根據上述考慮決定大選日期，已經是超級的干涉行爲了。美軍總司令部規定四月十日（一九四六年）為選舉日期。根據一九四五年年底所製定的選舉法，在新選舉中，男女的選舉权和被選舉权完全平等，並在大選舉區採取了可以在選舉票上選舉兩名或三名候選人的有限制的連記名投票制。日本共產黨在選舉鬥爭中的基本口號，是廢除天皇制度，建立人民政

府。因此日本共产党成爲以反共和維護國體、即維護天皇制爲唯一招牌的自由、進步、協同各党的主要攻擊目標；社会党也拒絕和共产党進行聯合鬥爭，而參加了維護天皇制的陣營。

當選舉鬥爭進入高潮時，在日本全國各地舉行了由工人、農民和市民团体所主办的打倒幣原內閣的人民大會。參加大會的除共产党员、社会党員外，還有廣大的一般人民。特別是在日本首都東京，幾乎每日都有一萬到數萬名的工人、市民和近郊農民，不斷舉行了旨在打倒幣原內閣的集会和示威遊行。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即在投票前夕，在東京舉行了有數萬人參加的倒閣人民大會，並於會後前往首相官邸遊行示威。儘管守衛首相官邸的警察隊曾經以手槍威脅示威隊伍，但是羣衆相繼擁向官邸門前，而且不肯離開一步。示威隊伍採取了包圍首相官邸的隊形，不斷高喊“要求幣原內閣立刻辭職”的口號。不久約有一百五十名武裝警察馳來增援，警察隊命令示威隊伍立刻解散，最後竟開槍射擊。羣衆的情緒越來越激昂，正當羣衆要和警察相打時，美國憲兵的吉普車闖入羣衆隊伍，並立即用棍棒毆打羣衆。聽到情形緊急的消息後，美軍第一騎兵師霍夫曼准將所指揮的六輛坦克部隊開來增援，他們不僅佔領了通往首相官邸的一切馬路，並且採取包圍陣勢準備在必要時一舉消滅示威羣衆。此外，美國憲兵分乘六輛吉普車在示威隊伍中縱橫馳騁，在羣衆代表正向內閣官房次長要求會晤幣原首相時把羣衆驅散了。當時目擊這種情形的美國新聞記者曾經互相議論說：“這和德國革命及希特勒上台時的情形一模一樣”（馬克·蓋因：“日本日記”）。美國政府僅在離此半年前還發表聲明說：日本人民爲了達到民主革命的目的必須行使暴力時，只要不威脅美國佔領軍的安全和妨礙佔領的目的，美軍即不予干涉。然而連日本人民舉行一次完全非武裝的、根本談不上暴力革命的示威遊行時，美國軍隊竟動員了如此大規模的武力進行鎮壓。美國式的、麥克阿瑟式的“民

主義”就是如此。

美國佔領軍之所以在四月十日(一九四六年)的大選前夕進行了這個鎮壓,不外告訴日本政府及一切反動勢力,它將堅決地站在它們一邊,並對它們加以鼓勵。大選的結果自由黨當選人數為一百三十九名成為第一黨;第二黨是進步黨,當選人數為九十三名;社會黨的當選人數為九十二名,僅比進步黨少一名。社會黨的這種飛躍發展和共產黨雖在其他各黨集中攻擊下仍能獲得約二百一十四萬選票及六名當選者;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完全是意外的打擊。

照例在大選後,必須以新國會為基礎重新組織內閣。但是幣原首相因為美國佔領軍在四月七日替他驅散倒閣示威隊伍,從而增加了勇氣,無論如何也不肯實行內閣總辭職。幣原利用當時進步黨正被黨魁問題所苦惱的機會取得了該黨的總裁地位,他以這個地位一方面裝出要把內閣放在國會和政黨的基礎上的姿態;另一方面表示他的地位是受命於天皇的大權,因而沒有天皇的命令,他就不能離去。幣原公然搬出明治時代官僚內閣的腔調而想繼續戀棧下去。根據社會黨的提議,在社會黨、共產黨、協同黨、自由黨共同參加下,組織了一個四黨聯合倒閣委員會。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聯合力量是偉大的。自由黨之所以能夠採取這一和共產黨聯合的空前行動,是因為自由黨害怕它被擯棄於反對幣原內閣的羣衆鬥爭之外的緣故。在國會以外,工會、農會、市民團體及其他民主組織,也都為了打倒幣原內閣而一齊行動起來,組成了倒閣執行委員會。人民大會不斷地召開,示威遊行連日震撼了首相官邸。假使從這種和國會內外互相配合的偉大鬥爭來看,簡直是人民大眾所期待的民主統一戰綫已經開始走上第一步了。事到如此,不論幣原如何以美軍總司令部和天皇的大權為靠山,也不得不提出總辭職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這是社會黨和共產黨兩黨因聯合而取得統一的人民

羣衆反对天皇專制主義大仗鬥爭的勝利；大日本帝國憲法，也在這時被人民所粉碎了。從此以後，任何一個日本政府，想靠天皇的權威和勢力撐腰已經不再可能了。

幣原內閣總辭職後，自然应当以倒閣主要力量的社會黨爲首，組織在野各黨的聯合政權。社會黨提出由它担当首相的要求，並曾得到共產黨的有力支持。當時共產黨並不一定想要參加內閣，只是要求由四黨就糧食、通貨膨脹及失業等問題有關當前的緊急政策締結協定，並由社會黨所領導的內閣來實行。對於這一點，自由黨除要求由它担任首相外，並藉口在修改憲法問題上根本和共產黨的意見不同而拒絕締結政策協定。它企圖藉完全另外一個問題來轉移共產黨建議的目標，以便達到破壞到那時爲止的聯合鬥爭和獨佔倒閣果實的目的。恰在這時，關鍵所繫的社會黨開始分裂成爲左右兩派了。左派堅持應由社會黨担任首相，否則就應該站在在野黨的立場上。以西尾末廣爲首的右派和自由黨相勾結，主張排斥共產黨，建立以自由黨爲首相的所謂全國一致的聯合政權。右派並且認爲，日本目前已陷於空前的危機之中，關於應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已無爭論餘地了。僅在幾天以前的選舉中，他們還高唱由於日本已經面臨嚴重的危機，唯一拯救危機的方法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他們一旦當選，立刻就變成這種醜態了。但是假使將西尾一夥人的這種變節行爲，看成只是爲了渴望大臣地位，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了。正如以後（一九四八年一月）西尾本人在衆議院所証實的一樣，他們從大資本家那裏領了金錢，其唯一任務是以“社會主義”的姿態欺騙人民，以便達到“防止赤旗的暴風雨”的目的。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底，由於西尾等人和自由黨的共同陰謀，四黨聯合委員會僅剩下一個空名了。

這時，日本人民在糧食困難、通貨膨脹、失業等的危機日趨嚴重的環境下，迎接了日本投降後的第一屆五一勞動節——這

是隨着二·二六事件^①被禁止舉行紀念以來的第十七屆五一勞動節。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在東京有五十萬羣衆集會於人民廣場——日本人民不知何時起把原來的皇宮前廣場稱爲人民廣場了——前，會後並在市內舉行了遊行示威。而在日本全國各地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的工人、農民及一般市民，總數竟達二百万人。大概这在資本主義各國中，要算是規模最大的一次五一勞動節了。於是要求“穩定生活和建立民主的人民政府”的口號，震動了日本國內各地。

在五一勞動節以前，右派社會黨和自由黨在四黨聯合委員會中的陰謀活動，由於羣衆爲迎接五一勞動節而日益高漲的壓力，曾受到某種程度的抑制；但是到了五一勞動節以後，他們的陰謀策劃就日益表面化了。他們不但從四黨聯合委員會中完全剝奪了共產黨的發言權，以致使社會黨的勢力比重一落千丈；並且企圖組成以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爲首的自由黨、進步黨、協同黨三黨的保守聯合政權。就在這個時候，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鳩山一郎由於佔領軍最高統帥的備忘錄而被列爲戰犯，並被禁止担任公職。

整肅鳩山，決不表示美軍總司令部對於民主勢力具有好意，這不過是它在表面上對民主勢力的讓步而已。美軍總司令部選擇了幣原內閣的外務大臣吉田茂來代替鳩山。吉田在一九二七年田中軍閥內閣中是鳩山的同僚。吉田最初以日本駐中國瀋陽總領事的地位，成爲東方會議的最中心人物之一，其後他在田中內閣中曾担任外務次官，最後他竟爬上了日本外交官最高地位的駐英大使。他和東條等人物比起來，有傾向美英實力的區別。他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與近衛文麿等大臣勾結，主張迅速向美英投降以便反對蘇聯，這就是他被美軍總司令部看中的理由。他

^① 二·二六事件，即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少壯軍人殺害政府領袖的事件，這個事件是日本進一步法西斯化的標誌。——譯者

和美軍總司令部的高級官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在幣原內閣中担任外務大臣時所以敢於公開反对解散日本財閥，那是因為他知道美軍總司令部的內心並無实行解散財閥的意思。吉田在性格上是一個典型的官僚，和民主主義既無任何關係，也無絲毫因緣。當時（和今天不同）他沒有多少錢，但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特殊寵信，他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当了自由党的總裁，五月二十一日組成了吉田內閣。

五月十五日，在盟國对日委員會上，美國代表艾奇遜關於如何處理根據東京五一勞動節慶祝大會的決議向該委員會提出的請願書問題，曾聲明說：“美國不論在世界什麼地方，都不歡迎共產主義”。吉田茂當時大概感覺這是美國佔領軍對他就任自由党總裁的賀禮吧。五一勞動節請願書的內容不過是希望建立一個民主政府而已，但是却被艾奇遜扣上一頂共產主義的帽子而表示不歡迎。

在這個時期，糧食危機依然日益嚴重。糧食配給，如在北海道遲發和欠發竟達數十日的配給量——最嚴重的時候，竟達一百四十日的配給量。在全國範圍內則遲發和欠發的達二十日到三十日的配給量。於是在東京、大阪等城市裏，開始出現了因飢餓致死的人。城市裏的小市民最初變賣他們的衣服和傢具，藉以換取些許糧食勉強过着“吃菜根的生活”，但到最後連可以變賣的東西都沒有了。另一方面，如同上述，統治者終日熱中於政治陰謀和憲法議論，他們絲毫不顧及人民的生活。對於日本國民來說，當時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吃飯”而非“憲法”。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東京市民在人民廣場上召開了“突破糧食危機的人民大會”，參加大會的計有二十五萬人。大會要求吉田內閣辭職，建立一個能保障糧食、工作、土地的人民政府。會後並到首相官邸前面舉行了示威遊行。大會的代表德田球一等除對吉田提出放棄組閣、把隱匿的糧食分配給人民及其他要求外，

並要求和吉田見面。但是這個要求被吉田拒絕了。當日數萬飢餓羣衆在初夏的太陽地上一直站到傍晚，等候着談判的結果。入夜後在首相官邸外面的羣衆遵照代表們的指揮解散了，但是代表們仍舊在官邸內將鬥爭繼續堅持下去。

據馬克·蓋因在“日本日記”中說：在這種羣衆的壓力下，吉田曾在五月十九日深夜一度決心放棄組織內閣。但是第二天（二十日）早晨，麥克阿瑟發表了一個“警告多數暴民舉行示威和騷擾的聲明”。聲明中說：“他們（示威暴民）不僅是對有秩序的政治的威脅，並且威脅了佔領本身的基本目的和安全”，又說：“我爲了糾正這種可悲的狀態，將不得不採取必要的手段”。日本的資產階級報紙，都把這個聲明大加渲染。它們把五月十九日的示威遊行，儼然說成是暴徒的騷擾，並把這個事件和前此的艾奇遜聲明相提並論，報紙上充滿了藉口反共和在反共名義下的反人民色彩。實際上五月十九日的示威遊行，和所謂“暴徒騷擾”毫無相同之點。就當時的情勢說，不發生像一九一八年“米騷動”那樣的羣衆暴動是不可理解的，但羣衆竟秩序井然地採取了有組織的絲毫不亂的行動。其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爲這時有了爲一九一八年所未有的共產黨的領導和民主性的羣衆組織，即羣衆本身已經成長起來了。唯其如此，麥克阿瑟才企圖採取鎮壓日本人民的步驟。他所害怕的，並不是日本人民的單純飢餓暴動，而是已經發展爲秩序井然的、有組織的並足以威脅統治者的權力的人民力量。

五月十九日夜裏駭得發抖的吉田，由於麥克阿瑟的打氣恢復了勇氣，於是就在五月二十一日，以自由、進步兩黨作爲國會中的基礎，組成了壟斷資本、地主和官僚勢力的聯合內閣。在打倒幣原內閣後，假使沒有美國佔領軍的有力支持，民衆的革命高潮原已迫使吉田的組閣趨於流產，但是就在这最後關頭，民衆的革命高潮却被巨大的反革命勢力所擋回了。

但是通过这场斗争，终于打破了或者显著的削弱了把美国佔領軍認為是改革者的幻想。这就是說把偽裝敌人的假面具揭穿了。也只是因為有了这场偉大的斗争，才迫使美日統治階級不得不重新頒佈一個在數量上比第一次“土地改革法”較為進步的第二次“土地改革方案”，並且不得不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主權屬於國民”。

第二節 工農組織的發展与二·一總罷工

一 从第一次吉田內閣到十月攻勢

美帝國主義和人民革命之間的假“蜜月”，以第一次吉田內閣在麥克阿瑟直接支持下成立時宣告結束了。日本人民的進步程度，已經迅速超过了偽裝的“改革者”——美國佔領者——所能容忍的限度。反革命的吉田內閣為了抵抗这种革命力量，在其執政後首先發表了一個“維持社会秩序的声明”，其中除宣稱不能承認工人在勞資糾紛時管理生產的权限外，並稱將斷然採取保護“社会秩序”的步驟（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至於吉田所說的“秩序”究竟是什麼意思，則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用武裝警察隊襲擊正在罷工中的“讀賣新聞社”職工的行動中，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了。“讀賣新聞”这家報紙在太平洋战争時期——以及从这次罷工後直到目前為止——即使在法西斯工具的各家報紙中，也可算是法西斯色彩最濃厚並且是最富於战争氣味的報紙了。日本投降後，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讀賣新聞社”就組織了職工會，它除要求从事社內的民主改革外，並要求战犯社長正力松太郎——警官出身，以干預东京市政而出名的大流氓头子之一——及其他一切重要負責人必須立刻全部辭職。当这个堅持不屈的斗争進入最激烈的階段時，

十二月三日（一九四六年），正力接到美軍總司令部把他作為戰犯嫌疑者的逮捕令。於是正力松太郎不得不辭掉社長的職務，由他推荐馬場恒吾繼任社長。於是“讀賣新聞社”的罷工，就以成立一個由社長和職工代表雙方組成的經營協議會，凡有關於編輯和業務的重要事項必須經過雙方協議以及其他的條件而告解決。

“讀賣新聞”從這時起，在日本資產階級各報紙中，成為最民主的報紙，因此得到人民大眾、尤其是勞動人民的支持。唯其如此，“讀賣新聞”遂遭到美軍總司令部與日俱增的壓迫，而在為了打破糧食危機的五一勞動節示威遊行和吉田內閣成立以後，這種壓迫就更加嚴重和表面化了。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馬場社長依靠美軍總司令部和吉田政府的支持，突然要求六個編輯幹部辭職，但是他們拒絕了這個要求。六月十四日，馬場社長宣佈開除上述六名編輯幹部，於是引起了反對解僱和保衛新聞民主化的鬥爭。當時職工人員既沒有舉行罷工，也沒有發生怠工現象，報紙仍舊照常發行。但在六月二十一日約有五百名武裝警察突然襲擊“讀賣新聞社”，武裝警察由社長派方面的人帶路，發生了毆打反對社長派的暴行。最後警察闖入編輯室，連一紙傳票都沒有，竟將五六名編輯部人員非法逮捕去了。這即令在聞名世界的日本言論鎮壓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暴行。“讀賣新聞社”的職工人員，最初始終根據言論自由和工會法，對這種警察暴力進行鬥爭。最後各種辦法都想盡了，從七月十三日起進入罷工狀態，職工人員據守印刷廠，使報紙無法發行。當罷工鬥爭進入第四日——七月十六日時，屬於社長派的人員在數百名武裝警察的保護下，率領暴徒數百名襲擊印刷廠，用暴力把罷工人員趕了出去。而“讀賣新聞”從第二日（七月十七日）起，又恢復了和它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完全相同的法西斯反動面目了。在太平洋戰爭中，“讀賣新聞”每日曾用最卑劣的謊言宣傳“鬼畜美

英”^①的殘暴行爲，但在這次恢復反動面目以後，則竭盡全力從事把美軍當作“民主主義的救星”的宣傳，並大肆散播“赤魔蘇聯”的謊言來代替從前的“鬼畜美英”的宣傳。

吉田政府和美國佔領軍企圖在日本建立的“社會秩序”，不過是像“讀賣新聞”這種靠暴力撐腰的反動秩序而已。日本處在這種“秩序”政府的統治下，糧食配給的秩序越來越混亂，甚至有的地方發現有欠發一百四十天配給糧的現象，結果只有積極地依賴於通貨膨脹了。吉田內閣成立時，日本銀行的貨幣發行額爲三百六十億日元，但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就已經超過停止使用舊日元前的六百億日元。一九四七年一月，貨幣發行額已經突破一千億日元了。大藏大臣石橋一面謊稱通貨膨脹立刻即將停止，另一方面却讓日本銀行大量發行鈔票。日本統治階級利用通貨膨脹這種不易被人發覺的方法，盡量降低實際工資，他們不惜以榨取人民大眾的金錢來培養和復活壟斷資本。一九四六年八月，日本建立了一個復興金融金庫，資本一百億日元全部由政府出資（即是人民的稅款），一九四七年一月起開始營業，一年之內它的資本就擴充到五百五十億日元。它一方面發行“復金債券”促使通貨膨脹更趨嚴重，另一方面將二十億、三十億日元的大量資金“貸給”（與贈送無異）三井鑛山、三菱鑛山、昭和電氣工業、北海道煤礦、住友鑛山等財閥公司，幫助壟斷資本的復活。而日本政府却把這稱爲“重點主義生產”，說是復興工業必須先從恢復一切工業之基本物資的煤鐵工業着手。

在反抗以壟斷資本和大地主的利益爲“重點”的政治所引起的飢餓、通貨膨脹和工業破產的鬥爭中，日本工人加強了本身的團結和鬥爭的力量。在吉田政府和法院的鎮壓下，日本工人仍經常採取管理生產戰術來進行反抗。工會在繼續不斷的罷工高

^① “鬼畜美英”是照美國人和英國人爲鬼和畜生的意思。——譯者

潮中，名副其實地一天天地發展起來。一九四六年八月，全日本產業別工會會議（簡稱“產別”）和日本工會總同盟（簡稱“總同盟”）這兩個規模巨大的全國性組織成立了。加入“產別”的工會（以企業為單位）計有二十一個，會員總數為一百六十三萬人；而日本工會總同盟也組織了八十五萬五千名工人。從這時起，以前就有分裂趨勢的日本勞動戰綫的兩種潮流，不僅在全國範圍內清清楚楚地劃分開來，而且左右對立的形勢也明確起來了。一九四六年十月，日本工會會議也成立了，加入這個組織的是那些不屬於前述兩大組織的中立派工會，會員總數據稱有三十萬人。此外，從一九四六年五月到十月，還先後成立了國營鐵道工會總聯合會（簡稱“國鐵”）、日本電氣產業工會（簡稱“電產”）等規模龐大的全國性獨立工會組織。一切勞動部門，從工廠、鑛山、交通運輸、電信部門等起，一直到學校教員、官公廳中不參加實際業務的下級職員以及公司職員等，都建立了工會組織。而在農村中，農民協會也發展起來了。

隨着全國性工會的成長，勞動爭議也逐漸具有了全國性的規模。一九四六年八月，海員工會為了反對解僱四萬三千名工人，舉行了罷工。海員工會幹部中雖有主張為階級而戰鬥的和主張勞資協調的騎牆派的對立，但是絕大多數工人聽从前者的領導。從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起舉行了連續九天的全國性大罷工，並且獲得了完全的勝利。海員工會的罷工鬥爭，為其他產業工人創造了良好的先例。一九四六年七月，日本國營鐵道當局聲明，決定從五十五萬名職工中解僱約十三萬人。關於這一點，“國鐵”工會幹部之間依然存在左右兩派的對立，以致鬥爭的行動不能統一，但是由於海員罷工的鼓勵，完成了如至九月十五日當局仍不全部撤銷解僱計劃，就斷然實行全國性罷工的準備。因此，鐵道當局終於不得不撤銷解僱工人的計劃。

接着從一九四六年秋季起，由“產別”所領導的為要求提高

工資和反对解僱工人的所謂“十月攻勢”的大規模罷工，在電氣工業、機械器具、煤礦及其他幾乎所有的大工業部門都爆發了。同時，東京芝浦電氣工会和日本電氣產業工会也舉行了罷工。這一連串的罷工鬥爭，大体都以工人的勝利而告終。這個勝利之所以為勝利，不僅在於工人達到了眼前的經濟要求，而真正的勝利乃在於使他們懂得了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意義。

二 二·一總罷工

當“十月攻勢”大体快要結束時，即一九四六年年底，以教員、“國鉄”、全遞信從業員工会（即全國郵電工会、簡稱“全遞”）為中心的全國官公廳二百五十一萬勞動者要求提高工資、發給年終津貼和建立最低工資制的鬥爭高漲起來了。這些工会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組成了“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簡稱“共鬥”）。約在一星期後，恰好也在進行勞動爭議中的全日本交通運輸工会和日立製作所工会總联合会等屬於“產別”系統的十六家私營公司的工会，和“共鬥”聯合起來，共同組成了“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簡稱“全鬥”）。“全鬥”的力量隨着年終的迫近日益壯大，甚至連“總同盟”的工会也與之聯合起來。於是日本全國數百萬產業工人，結合成為工人階級的整体了。

恰於這時，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遠東委員會宣佈了“關於日本工会組織的十六項原則”的決議。這個決議除認為應將工会當作日本民主化的中心力量並強調工会必須自由發展外，還規定“佔領軍當局只在它認為罷工及其他作業的停止直接妨礙佔領目的和需要時，始能加以禁止”。此外還明確訂出下列原則：准許工会參加政治活動、禁止資本家和政府向工会派遣間諜、取消其他妨害工会的組織和機關等。這個決議鼓勵了日本工人和全体人民。

然而麥克阿瑟司令部和吉田政府，竟置這個決議於不顧，它

們對於工人日益加強了高壓手段。美軍總司令部的軍官在日本工人進行全國大罷工時，曾把工會幹部叫去，口頭要求工人停止罷工。當工人追問這是否是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時，他們就含糊作答。在這以前，吉田政府及其友黨，不願共產黨和工會的反對，製定了所謂“勞動關係調整法”。其中除規定“公用事業”的罷工必須於三星期前預先報告外，還有其他限制工會活動的條款。儘管國會曾有本法案應與即將製訂的“勞動基準法”（其中規定了八小時勞動制、男女同工同酬及其他勞動條件的標準）同時實施的諒解，但吉田政府在“勞動基準法”尚未製訂前，就將“勞動關係調整法”適用於“十月攻勢”中的工會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甚至發生了官方和暴力團體殘害罷工工人的事件。同年十月底起，東洋鐘錶公司埼玉縣上尾工廠發生了勞動爭議；從十一月底起，工會採取了管理生產的行動。這個行動曾予公司資方以嚴重的打擊。在這次行動以前，每當發生勞動爭議時，就有一部分工會人員分裂工會，自稱“重建同盟”，充當公司資方和警察的爪牙，進行破壞罷工團體的活動。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重建同盟”幹部和城市的暴力團體在大宮警察署候補警佐（野呂某）指揮的武裝警察秘密保護下，突然襲擊了工廠。工會會員和在當場聲援的工人們，當時手中連一根木棍都沒有。他們全體只是用手挽着手的和平方法防禦暴徒，當然這種方法是抵擋不住暴徒的。暴徒們在警察保護下，除使包括女工在內的數十人負重傷外，並殺害了從富士產業公司大宮工廠前來聲援罷工的青年工人齋藤三郎。然而令人吃驚的是，僅僅手挽着手的罷工工人卻被認為犯了“暴行”而接二連三地被逮捕去了；而真正的暴徒，直到很久以後為了掩飾殺害齋藤的罪行才被逮捕了兩個人。日本的資產階級報紙只報道警察、資本家和“重建同盟”片面製造的謊言，而對於真實情況却絲毫沒有提起。並且，在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美國憲兵乘坐着吉

普車闖入罷工的示威隊伍中進行破壞。美國憲兵在東京芝浦電氣工業公司工会联合会進行罷工時，也曾幹過同樣的破壞活動。（這次罷工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其後每當發生同樣事件時，警察就公然而接襲擊罷工團體，而檢察局則以莫須有的罪名不斷地逮捕罷工工人。在這種暴力下面，以團結得似鋼鐵一般見稱的悲壯已極的罷工團體也終於失敗了。）

吉田政府和美軍總司令部的唯一勞工對策，就是使用這種暴力鎮壓工人和利用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進行分裂工会的活動。它們甚至對於像“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這種溫和的經濟要求，都置之不理（當時教員工会所要求的日薪是六百日元，而普通的工人則為一千日元）。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吉田首相在廣播演說中惡狠狠地大罵工人為“不逞之徒”。這句話曾在全體工人和民主主義者中，引起極大的憤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鑑於一切交涉盡歸無用，所以根據“勞動關係調整法”的規定，預告說：如果到二月一日資方仍不接受勞方的全部要求時，就以這一天為期限進入無限期罷工。兩天以後，吉田自由黨的外圍黨的新銳大眾黨的黨員企圖暗殺“壺別”領袖听濤克己，使听濤受了傷。於是在所謂“民主”日本，右翼恐怖分子又開始橫行了。

吉田茂一方面把工人當作“不逞之徒”，不惜使用恐怖分子進行鎮壓；另一方面他的政府和社会黨不斷地召開懇談會，企圖使右派社会黨人入閣以便欺騙工人。但是“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和“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發表宣言說：即使社会黨參加吉田內閣，它們也將為貫徹全部要求舉行總罷工。社会黨鑑於在這種情況下公開充當吉田的爪牙對於自己不利，所以中途停止了參加吉田內閣的談判。

吉田政府曾動員一切新聞報道、廣播電台、演說會、暴力團體和警察等工具，拚命努力離間勞動大眾和其他國民的關係。

他們捏造謊言大規模進行欺騙宣傳；例如說工人老是進行罷工使國家遭受破壞、只知要求增加工資使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等等。然而，從事生產怠工、掠奪人民財富、利用永無止境的通貨膨脹把人民逼到窮困不堪地步的不是別人，正是吉田政府和資本家；它們以遠比增加工資快數倍的速度推進通貨膨脹，使壟斷資本在國民生活的破產中大發橫財。日本工人假使不以總罷工來保衛勞動人民的生活，並使吉田政府和資本家領教一下人民的力量，那麼日本這個國家將是不可救藥的；所以這個總罷工是救國的總罷工。這一鬥爭，儘管原來是從單純經濟要求出發的經濟鬥爭，但這一鬥爭後來發展成爲即使在國際勞工運動史上也是少見的大規模罷工時，就必然會帶有深刻的政治性質了。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全國工會聯合鬥爭委員會”主持下，召開了一個“打倒吉田內閣克服危機的國民大會”，參加大會者一致表示信念說：唯有舉行二·一總罷工，才能拯救祖國的危機。

美軍總司令部對於“全國工會聯合鬥爭委員會”和“全官公廳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雖然日益加緊其干涉和壓迫，但是都遭到了工人階級的堅決反擊；而吉田政府却依靠美軍總司令部撐腰，始終採取強硬態度。因此，工人和統治者的全面衝突，已經到了勢所必至的地步。從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早晨開始，一切工廠和一切工作崗位的所有工人，都被時刻高漲的堅決鬥爭熱力鼓勵起來。這無疑是革命情勢的迫近。但一月三十一日午後二時，美軍總司令部發表了一個由麥克阿瑟親自簽名的文件，命令禁止總罷工。

“全官公廳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曾在極短時間內討論了應否服從這個命令。它的判斷是：如果置這個命令於不顧堅決舉行罷工，不但將在自己的陣營內引起混亂，甚至可使整個的形勢陷於不利。因此“全官公廳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決定服從命令

停止罷工，並把“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和“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一起解散了。“全官公廳工会共同鬥爭委員會”委員長伊井彌四郎（“國鐵”）在停止總罷工的廣播結語中，曾悲痛地号召說：“全体工人必須團結起來，退一步是爲了進兩步”。

二·一總罷工因此以未實行而告終。工人碰上美國佔領權力這個巨大牆壁不得不暫退一步。假使日本工人階級不加強階級內部的統一和團結，不加強工人、農民和市民尤其是工農聯盟，就不可能打破這道牆壁。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組成了一個大家所期待的、全部工会的統一組織，即由參加“全國工会聯合鬥爭委員會”的各工会和“總同盟”等共同組織的“全國工会聯絡協議會”（簡稱“全勞聯”）。二·一總罷工不僅表示日本工人階級在短期內的迅速成長，而且還成爲以後飛躍發展的起點。

而且，二·一總罷工終於使一向被視爲“神聖的”麥克阿瑟本身直接來干涉日本工人階級，這就暴露了美國佔領軍及日本統治階級的反動性和它們的危機的深刻程度。吉田政府也並未曾因此度過了它的危機。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麥克阿瑟寫信告訴吉田說：日本業已接近舉行大選的時期。這也就是說：吉田內閣應當辭職的日期已經來到了。這時，進步黨的犬養健和自由黨的蘆田均鑑於人民大眾的革命情緒日益增長，感到必須換掉這塊“保守主義”的招牌。於是他們改變方針，提倡什麼“修正資本主義”和“中間道路政治”。一九四七年三月底，犬養健把進步黨解散，蘆田均緊跟着也退出自由黨；他們共同組織了一個“日本民主黨”。吉田茂爲了想和社会黨組織聯合內閣來延長他的內閣壽命，曾和社会黨右派進行了一連串討價還價的談判。社会黨爲了維持它的這塊假招牌，雖曾要求吉田答應——即使不實行也可以——停付戰時軍事公債的利息，作爲它參加內閣的條件；但是吉田連這一點都拒絕了。因此兩黨聯合內閣未獲成功（關於這次的政治買賣，係參照井上清著：“日本政治腐敗

史”）。

儘管自由黨和進步黨之間不斷發生狗咬狗的爭吵，但是它們在對付日本民衆問題上却是一致的。它們爲了準備麥克阿瑟所命令的選舉，在根據舊憲法召集的最後一次“帝國國會”中的最後數日間，雖然繼續演着狗咬狗的醜劇，但却把選舉法修改得更反動了。它們把大選區有限制的連記名投票制改爲中選舉區單記名投票制，還爲選舉期間使用文字圖畫宣傳及其他事項規定了無數的限制。總之，它們不外想利用這些限制使共產黨、社會黨和其他工農團體的選舉運動陷於極端不利的地位。於是，這個爲醜惡的天皇制裝璜門面的國會直到最後一剎那間仍由其本身證明了它的醜惡和反動性，並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了它的壽命。當然“老兵不死”^①，它還會以新“國會”的面貌出現的。

三 麥克阿瑟的佔領理論

麥克阿瑟在二·一總罷工以後，也不能不回顧和重新考慮一下迄今爲止的佔領政策了。他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致美國國會的報告書中說：

現代戰爭的勝利，僅憑在戰場上打垮敵人是不能獲得的。這就是“不僅應當破壞戰爭的物質基礎，而且必須消滅驅使人們欲走向戰爭的人類本能。要想消滅這種人類本能，僅憑戰敗的一時打擊是不能使其完全屈服的。因此必須從精神上加以徹底的改造。這種改造不僅是能夠支配戰敗了的人們，而且必須是能夠將決定性的影響給予他們的後代子孫”。麥克阿瑟的意思是說，假使不能使日本人的子孫萬代都有對美國低頭的意識，就不能稱之爲真正的勝利。所以他認爲必須對已經投降的日本給

① “老兵不死”是引麥克阿瑟的話。——譯者

予更徹底的打擊。因此，“對於完全依靠外部供給食糧及其他補給品的部隊作徹底的封鎖，乃是粉碎這個部隊的有效武器（中略）。對於投降後的日本，這種封鎖不但在繼續維持並且還擴大加強了”。麥克阿瑟就是按照這種政策，有計劃地使日本人民陷於飢餓狀態。然而他又說：

“假使繼續維持這種狀態，將使無數日本人瀕於飢餓；其結果必然引起社會不安、秩序混亂和暴動等。而比這更壞的，是這種飢餓狀態會驅使民衆成為任何邪惡思想的俘虜”。這就證明日本人民為了生存的鬥爭，已經發展到使統治者感到威脅的地步；而且即將發展成為對於帝國主義來說是最“邪惡”的革命鬥爭。從為了打破糧食危機的五一勞動節到二·一總罷工，日本的形勢正是如此。所以麥克阿瑟認為不得不緩和這個封鎖政策。“因此，必須供給日本以糧食及其他緊急的救濟物資”。於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底，麥克阿瑟在北海道地區“發放”了少量的美國家畜飼料和賣剩下來的小罐頭食品，從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九月之間，在日本全國“發放”了這類物資共約六十一萬七千噸，並想利用這種手段強迫日本國民感激麥克阿瑟和美國的宏恩。然而，這不能算是美國的慈善。

麥克阿瑟企圖使用將蝦釣龜的方法、即用微乎其微的釣餌迫使日本全體人民上鉤。他說：“這類物資的價款，將來可向日本請求償還，並將以美國有權優先取得日本財產為保證，所以這並不是慈善的施捨”。他在另一場合（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招待美國新聞記者時）曾洋洋得意地說：“由於美國把糧食送給日本，已使日本和美國密切地結合起來了”。日本的政府和統治階級也許如此，但民衆是否能如麥克阿瑟的願望，不是已經從工人日益對他的反抗看出來了嗎？

“軍事佔領充其量不過在一定時期內可以有效的這一事實，已由歷史所充分證明。假使超過了一定期間，不但被佔領國民

的惡化(應讀爲抵抗——作者)會有迅速的發展，他們處於這種狀態被剝奪了基本的個人自由，所以越來越不好管理(因爲羣衆有了組織——作者)；而在另一方面，佔領軍的品質也越來越壞，他們不久會养成了支配意識，終於陷入了統治民族的幻想”。

這就說明了麥克阿瑟已經預感到日本國民的成長已經到了發動二·一總罷工，將對他們帶來怎樣的結果。於是麥克阿瑟不能不考慮早日結束對日佔領和統治日本的新方法。他說：“儘速恢復和平與平時狀態，必須是我們的明確目標。……而廢除目前所進行的軍事管理，恢復日本政府的統治，乃是我衷心所希望的”。他在佔領日本一年又六個月後，才漸漸感覺必須來談“媾和”問題了。這件事情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麥克阿瑟接見美國新聞記者時說得最清楚：“應當早日結束對日軍事佔領，締結正式的对日媾和條約，解散美軍總司令部”。那麼他所希望的，是怎樣的“媾和”呢？他接着說：

“但媾和並不是把一切指導和管理都完全取消的意思”。這就是說：媾和只是一個空名，實際上必須繼續佔領，以期達到永遠將日本完全置於美國統治之下的目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麥克阿瑟找到一個恰到好处的藉口：

“日本在憲法中規定必須放棄軍備。因此，爲了保護日本，或可准許保有少數軍事設施，或可讓日本人依靠世界的進步精神(應讀爲美國帝國主義——作者)。假使由聯合國來保障日本的安全，大概會受到日本人的歡迎。由聯合國管理，不但將被日本人所接受，且將視爲這不是壓制而是保護的行爲”。

這不就是一九五一年在舊金山所締結的兩個條約(按即片面对日和約與美日安全條約——譯者)的初步輪廓嗎？此外，我們從上面的話裏，還可以極其明顯地看出來，麥克阿瑟在日本憲法中之所以規定日本必須放棄軍備的真正意圖。他現在企圖用“媾和”這個新的釣餌使日本上鉤。然而，這個空有其名的、意在

使永遠佔領日本成爲合法化的“媾和”，並不像麥克阿瑟所理想的那樣簡單就可做到。總之，戰後的日本歷史，以二·一總罷工爲標誌，已進入了新階段。這個階段是“事實上的媾和”与殖民地化向前推進的時期，是法西斯主義在新殖民地的萌芽時期；而工農大眾的鬥爭已從一直听任幹部自由擺佈的華而不實的狀態進入每個羣衆都已提高覺悟和民族鬥爭已經被提上日程的時期，而且這還是帝國主義向民主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公開宣佈“冷戰”的時期。

爲了弄清日本投降後一年半之間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鬥爭的大體輪廓，我們首先就修改憲法、土地改革、解散財閥等問題加以概括的敘述。